

亚洲太平洋的国家、民族、地区与日美关系

——以形成东盟地区论坛的过程为中心

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教授 宇野重昭

一、亚洲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形成

1993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见《朝日新闻》社长中江利忠时谈到今后如何确立亚洲太平洋的安全机制问题,他说:“中国认为,可以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进行双边和区域性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加强沟通和信任。为此,中国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磋商。”(新华社北京8月6日发《中国通讯》)

在这段讲话中引人注目的是:第一,准备在日中之间就亚太安全问题进行磋商;第二,注意到该地区的“多样性”;第三,平行使用了地区概念和国家概念。这种表达方式在冷战全盛时期是不能想象的。当时军事和意识形态激烈对抗,实现安全保障的单位都是国家或国家联合。并且,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峙中,积极承认“多样性”的气氛淡薄,尤其象安全保障这类问题,由资本主义的日本和社会主义的中国进行磋商根本不可想象。然而冷战后的现在,国际政治的竞争中心从军事、思想的领域转移到以经济、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领域,由一、两个大国垄断支配世界市场的时代转变为围绕如何把地区、国家连结起来这一经济合作和综合安全保障问题进行竞争的时代。

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不言而喻,地区这一概念包含多种意思,并以多种含义而被使用。一般来说,按照地形和行政等观点,它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整体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土地范围,这时它大都以跟国家的中央相对的地方这一意思而加以使用。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区域研究”中,地区像“日本研究”、“中国研究”那样作为与国家相同等级的词汇而开始频频使用。进而当战后出现类似“EEC”(EC)和“经互会”那种国际性经济合作组织时,地区有时又作为居于国家之上的概念加以使用。但在当时,国际政治的核心单位始终是国家,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国际组织都把不得干涉各国内政作为一项原则。

可是到了近几年,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对国家或国民国家的怀疑变得日趋强烈,地区这一概念开始作为与国家相对立的抑或超越国家的概念加以使用。例如在社会学中,像城市和村镇县有共同利害关系那样,把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的生活共同体本身称为地区,通过学者给地区一词注入特殊的含义,并且还产生一种主张强调指出,以地区的状况改变中央政治的状况。^①此外,在国际政治学中也出现了一种要把超越国家主权的权威授予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普遍趋势。这些现象都是力图使国民国家这一框架相对化的运

动。“一言以蔽之，它象征国民国家的机能不健全，换言之，也是人们对国民国家的期待移向其它层次空间的现象。”（山影进：《“地区”的引言》）。②

不过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有许多国家还未确立起国民国家的框架，而且即便说是国民国家，国家和民族也未必相一致。多数国家是在历史上追求国家框架的形成过程中使民族的意识、内容和范围确定下来。作为所谓地方的地区为了对付中央的强化而重新形成新的“地区”。地区向中央提出的自我主张常常被指责为地方利己主义。因此，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力图使国民国家相对化，恐怕在某种意义上还为时尚早。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确信在世界史的意义现代已经成为使国民国家相对化提到日程上来的时代。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东盟（ASEAN）一面逐渐加固国民国家的框架，一面振兴超越国家的联合的地区，并不断发展国际合作。东盟的现代意义在于“不想把东盟这一联合作为一个绝对性地区，虽然在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方面均有重复，但其构想的目标仍然是尽量实现非磐石一块的柔软的区域性。”③不过这一构想的实现，特别是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不得不经历极其微妙的过程。东盟虽然承认美国的存在，但重点当然更多地置于东盟国家和地区独立性。可是美国却企图把东盟作为其世界战略的一环加以利用。另一方面日本虽然身处日美安全条约体制之中，但对亚洲仍想寻找一种独自的接近方法，它注视着东盟的柔软发展。另外，最近东盟、美国和日本出于它们微妙的共同利益，一起要求中国作出保证的气氛变得浓厚起来。

在这种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东南亚以及亚洲将会形成怎样的合作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国家的状况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下面我想以最近设立东盟地区论坛的过程为例，就亚洲的国家、民族、地区和国家关系问题进

行分析。

二、国家和地区相互渗透

在东南亚第一个达到国际性水准的地区框架——东盟诞生于1967年。它的产生决非是内部自发的，而是以越南战争和“共产主义”的外部威胁为契机。所以，认为当时滋长了建立在实质性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地区”意识的看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第一，当时国家的框架尚未完全确定，国民国家范围相对确立起来的只有泰国，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处在营造民族主义大厦的高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于1965年刚刚分离为各自的国家，至于后来（1984年）独立并新加入东盟的文莱当时还是英国的保护领地。第二，民族关系复杂。泰国人口的80%为傣族，华裔占6%；在印尼，马来系的爪哇族占40%，巽他族为15%，华裔2%；马来西亚的45%是马来人，华裔占32%；菲律宾以马来系的泰加洛、米沙鄢、伊洛干诺等民族为主；新加坡人口的77%为华裔，马来人为15%，印度人6%；文莱的70%为马来人，华裔占20%。各民族混杂，并不可思议地组成各自的国家。第三，华侨、华人对经济社会实际控制着巨大的影响力，有可能自发地产生建立国际经济圈的念头，但又害怕马来人的顽固反抗，因而表面上持极其慎重的态度。这是因为存在着“反共”会立即转化为“反华侨”的危险。此外，另一个问题是东盟的领导层以贵族、官僚、军人为核心，它们一面不断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一面又力图推进营造民族主义大厦。当时印尼的苏哈托体制、菲律宾的马科斯体制、新加坡的李光耀体制都显示出长期维持强权政治的状态，马来西亚的联合政府、泰国的他依政权也采取了限制民主主义的政策。在野党得不到发展，知识阶级的发言权受到压制，因“治安”的需要使国家经费达到反常的水平（铃

木司：《东南亚的危机结构》，劲草书房1988年版）。它们采取的“开发独裁”政策必然导致与发达国家资本相结合，实行过份亲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

尽管如此，它们强烈地要求自主性。这一方面是由于挣脱了帝国主义、殖民地时代的恶梦，同时也与独立自主地建设国家这一课题密切相关。它们一面建设各自的国家，一面为此而寻求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并力图借助发达国家。1967年发表的曼谷宣言甚至采取“掩饰反共彩色，提倡经济及社会合作，将来使任何体制的东南亚国家都可能参加区域合作的立场”，把国际合作的框架搞成具有松散或柔软的性质。它们虽然表面主张“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间的自主合作机构”这一国际合作，但在缔结条约和协定时却采取了不完整的形式，这也是因为出于它们希望推进各自国家的建设这一考虑。^④这种未完成的国家建设和松散的国际合作机构同时得到发展正是东盟在国际政治上的奇特之处。

但是在现代，既然国民国家的框架将继续得到加固，那么国际间相互依存关系就会快速发展。关于这一点，在介绍最近荒野、石井、村井等人编撰的《亚洲中的日本史》（全6卷）的同时，滨下武志在《地区主义、民族主义、全球主义》一节的《对民族主义的挑战》目中提出了以下令人深感兴趣的观点。他指出：“地区主义虽然含有以往的‘地方’领域的概念，但是不妨把它作为一种大区域的概念，开始主张取代以往国际关系的相互结合的理念和制度。另一方面人们不仅一直把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作为居于国家之上的概念，而且设想它们吸收国家的机能，或者时常出现相反的现象，即地球问题跨越国家直接与地方发生联系。”^⑤

总之，笔者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地球、国家、地方作为三个层次，与它们上下位置关系相比，现在正处于“相互渗透”的关系中。不言而喻，在现实政治的世界中国家的

统治力量、各种国际组织和地方的自主性都在继续发展，相对而言国家仍然是中心。但是，这三者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也是事实。现在可以说东盟为了发展国家不能缺少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地区的振兴。

三、冷战后东盟的发展

东盟作出相对独立性的姿态是在1971年发表《东南亚中立区宣言》之后，它与对美国“撤出越南”的估计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东盟虽然与日美发达国家维持着合作关系，但同时又预测将来与中国、苏联接近的可能性，开始摸索保持某种程度平衡的外交。这与其说“中立”，莫如称为“多元”外交的第一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与对抗外来刺激而实行联合相比，东盟更重视推进像区域内特惠关税制度和共同工业项目等内部的经济合作，开始把脸转向强化“地区坚韧性”的方向。在这一意义上，1975年设立的经济部长会议和1976年举行的第一届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决非偶然。但是，东盟不断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联合以适应来自国外的压力和变化这一自建立以来的传统因素时常起着作用，1977年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首脑举行了临时的非正式会谈，从而加强了相互关系。这当然是为了对付后来预料的美苏撤退和越南的新压力。这是东盟“扩大”的第一步。在其后的1978年，当越南和苏联加强同盟关系，开始对柬埔寨施加压力的时候，东盟各国协调一致，提出支持“民主柬埔寨”的方针。为对抗来自外部的威胁而强化集团联合这一东盟创建以来的集结逻辑仍然有其生命力。

在此期间，整个东盟除个别年份和情况外保持了每年6—8%的高速经济增长，提高了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比重。^⑥于是，一方面使强权政治得到加强，而另一方面又完满地协调发展了国民国家和区域性国际合作体

制。在这个意义上东盟具有“南方世界的优等生”这一特点。^⑦至少东南亚各国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正如邱恩田教授在前次日中国际研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美苏对世界事务的控制力受到削弱，特别是对亚太地区政治事务的干涉能力在下降，而第三世界、包括东南亚国家，独立意识在增强，对大国的依附程度大大减弱。”^⑧

因此，冷战结束后周边国家视东盟为该地区的东道主，对其发动外交攻势，从而推动东南亚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迫使东盟面临着进一步开放国家和地区的压力。具有其代表性的事例是围绕 APEC（亚太合作经济部长会议）和 EAEG（东盟经济集团）之间的角逐。

众所周知，APEC 始于 1989 年 1 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发出建立“松散的论坛”的呼吁，并于同年 11 月在堪培拉举行了第一届会议。出席会的不仅有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美国、日本、韩国和加拿大，其特点是把“开放的经济合作”作为会议的主题。不过最初人们悄悄议论采取这种方式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敲开东盟的门户。然而经过 1990 年 7 月的第二届新加坡会议到 1991 年 11 月第三届汉城会议时，由于中国以及香港、台湾的参加突然引起了会议内外的注目。不言而喻，香港是英国将归还的地区，1997 年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台湾则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明确主张的一个区（地区）。在这种时候钱其琛外长作为部长首次访问韩国也突出了会议的政治色彩。卢泰愚总统在这届会议上发表的基调演说中引人注目之处有：第一，以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开放的地区主义”为目标；第二，努力建立包括美加自由贸易区（NAFTA）在内的环太平洋对话场所；第三，明确了支持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态度。本来东盟一直把重点置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联合上，这次却出乎意料地配合

APEC，也许可以说这毕竟是反映冷战后时代的现象。可以推测作出这一选择的背景是，东盟认为这种论坛对抵制世界性的贸易保护风潮有其存在的价值，并认为目前参与该论坛所要建立的实质性伙伴关系是可行的。

但是东盟领导人的心情是微妙的。这也许可以从 1990 年 12 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发表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构想中获知。这一构想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排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因而其形态除东盟外，日本和中国的存在占有很大份量，再加上韩国、香港、台湾、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直截了当地说，正如从“注视东方”的马来西亚版获知的那样，马哈蒂尔既有力图仿效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面，同时在人权、环境、通商等问题又具有不同于欧美而与中国看法相同的另一面。然而这一构想作为集团经济的亚洲版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因此在 1991 年 10 月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将其名称改为东亚经济会议（EAEC），淡化集团色彩，把焦点专门集中在推进自由贸易上，并在 1992 年 1 月的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继续进行了审议。在东盟领导层人士看来，不单单 APEC，几个国际讨论场所的存在于东盟有利，他们认为 EAEC 构想有其魅力之处，如果来自欧美的外部压力增大的话，则能够经常使这一问题表面化。^⑨不过可以推测，东盟多数人主张避免过分地刺激美国，EAEC 应与 APEC 并行不悖，共同进一步加强以东盟为中心的经济合作组织，力图继续吸引日本和美国的资本。于是，1992 年 1 月举行的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回避了政治问题，把精力放在经济问题上，主要把到本世纪末实现 3 亿人口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作为目标，为此会议决定推进共同效果特惠关税（EPT）的实施。^⑩可以说这是符合东盟性格的多层次的见机措施。

那么，对于东盟的这种姿态美国和日本采取了哪些对策呢？

四、美国对亚洲的政策

在冷战后美国对亚洲的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贝克国务卿撰写并刊登在1991年11月13日发行的美国《外交》季刊上题为《亚洲中的美国——太平洋共同体的萌芽》的论文。^①贝克国务卿在这篇论文中指出，目前亚太地区对于美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同该地区的年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出美国对大西洋年贸易额的1/3。对美国来说，美国对亚太地区“维持参与”是“生死攸关的利益”，已经成为无路可退的核心问题。并且他对APEC的存在意义高度评价道：“只有这种通商方面的共同利益，才是顺其自然地形成牢固的地区联合的促进因素”，APEC恰恰“促进了世界以及区域性的贸易自由化，进而成为以努力解决相互依存课题为目的的重要机构”，“APEC最初对诸如电视、通讯等信息交流的必要性达成共识，而现又正在努力解决人才开发、能源、贸易与投资、海洋资源以及旅游观光事业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贝克只是期待APEC发挥超出经济合作机构的作用。他的思想所表达的正是“环太平洋国家认识并不断发展积极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这对于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取得成功是不可缺少的。”

此外，美国著名的亚洲研究学者斯卡拉皮诺教授在《外交》季刊发表题为《美国和亚洲——展望未来》一文中提出，“在所有意义上美国都是亚洲太平洋的一部分，美国不能贸然撤退。”他论述道：“美国应该以地区格局、世界格局把握两国间的经济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首先需要把APEC作为超越讨论和协商的场所的集合体使其不断发展。APEC最终将包括所有的区域国家，必须朝着支援后进国家和确立更加开放的国家间经济交流体制的方向发挥主导权。”^②对于斯卡拉皮诺来说，并且对于美国领导层人士来

说，像马哈蒂尔构想那种“由非白种人组成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正是一种“令人回想起过去大东亚共荣圈”的东西”。

对于美国领导层人士的这种构想，中国的陆琛先生在1992年的《北京周报》撰文指出：“根据贝克国务卿所阐述的‘太平洋共同体结构’，美国要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共同体是一个类似扇形的辐射结构，共同体的基地在美国，以美国为核心，向西辐射；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作为这一共同体的骨干；以美国与南朝鲜、东盟、澳大利亚盟国的双边关系作为这一结构的基础；以亚太经济合作作为扇面纤维结构，将共同体内各国联结到一起并且将这一结构逐渐向中国、俄罗斯辐射，最终将这些国家也纳入共同体内。”^③

从斯卡拉皮诺教授的论调中的确可以看到“以美国为中心扩大范围”的想法。当然他说得没有那么露骨。但是从整个美国来看，不是没有陆琛先生指出的那种侧面。在这里令人深感兴趣的是，以相互依存日趋发展的时代为背景，美国的有识之士排除带有新孤立主义色彩的美国民族主义，向亚太国家倡议建立某种意义上超越国家的共同体（community）构想，极力使国家相对化的努力由此可以窥视一斑。但是我认为斯卡拉皮诺教授所希望的是，把朝着这一方向的努力尽可能地与经济、信息和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使其“自然地”延伸。然而在美国现实的外交政策中，注重短期政治效果，性急的一面牵引着外交的整体。例如，早在1992年4月举行第四届APEC时就与美国的领导地位缠绕在一起，设立了事务局，使本来以“松散的论坛”为目标的APEC开始朝着“向国际机构转变”的方向发展。（《朝日新闻》1992年9月4日）

克林顿担任总统后变得越发性急。把在1993年7月早稻田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倡议各国首脑参加即将在11月份西雅图举行的APEC，而不是部长级会议；进而又于7月10

日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提出,把安全保障和支援民主主义等问题作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支柱。本来以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当作主题的 APEC 骤然加重了军事和政治的色彩。不言而喻,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举行首脑会议,“台湾、香港没有资格参加。”在此重提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论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作为克林顿总统也许是对国内玩弄的必要的政治把戏,但是这种发言和姿态自然给人们造成“美国企图发挥主导权”(《朝日新闻》7月7日)、“在亚洲安全保障优先”和“以姿态修正轨道”(《每日新闻》7月11日)的印象。

美国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东盟国家。而且,拒绝美国和澳大利亚参加的、一直停留在继续审议阶段的 EAEC 构想重新浮现出表面。此外,在亚洲安全保障构想中拉进中国和俄罗斯以牵制美国领导权的方案也变得具体化了。这确实有些像东盟的均衡感觉。于是,从1993年7月23日至28日举行了东盟外长会议和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的外长扩大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结果通过了使 EAEC 与 APEC 相联结的方案和设立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对话场所——东盟地区论坛。为亚洲安全保障设立大范围的对话场所,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在如何看待 APEC 的性质、使 EAEC 占有多大比重等基本观点上并未达成共识。总而言之,采取了满足各自要求的解决方式,具体问题则留待将来解决。

对于上述东盟和美国的动向,日本应如何对付呢?

五、日本对美国和亚洲的政策

即便是对日本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能否认,日本对亚洲拥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而且日本已经觉悟到自己是亚洲的一国。日本在政府开发援助(ODA)上把对亚洲的援助置

于优先地位。在债务积累问题上,日本也把对亚洲国家的关照视为首要责任和义务。从1992年日本与不同地区的贸易情况来看,与美国占日本出口总额28.8%、欧共体占18.4%相比,东南亚为30.7%(其中东盟占12%);在日本的进口贸易方面,美国和欧共体分别为22.4%、13.4%,而东南亚却占到24.7%(其中东盟占13.5%)。^⑭例如,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持续增长,1990年为82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8.8%),1991年增至962亿美元(占30.6%),1992年达到1043亿美元^⑮。仅从经济关系看,亚洲的存在对于日本较美国更为重要。

尽管如此,日本并不能轻视美国的存在。美国依然是强大的军事国家,发挥着世界警察的作用。在科学技术领域里许多方面超过日本。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智能领域占有压倒日本的优势,现在日本人的价值意识在许多方面都仰赖美国。而且,日本要对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进行反省,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和以军事为中心的安全保障政策上,舆论强烈要求日本不应掌握领导权。因此,人们普遍希望把全球性方针和安全保障托付于美国。对于日美安全条约,1991年的民意测验表明,50%的人们认为于日本有利,远远超过认为于日本不利的23%的比例。^⑯在1992年的民意测验中,52.7%的人们承认对日本有利。^⑰像内阁官房那种政府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表明,63.5%的人们肯定了这一条约。^⑱而对该条约持否定态度的人经常不足1/3。所以政府不得不尊重这种舆论。

其结果,日本政府对东盟地区论坛的设立一面尽可能地尊重东盟国家的意愿,同时又设法拉进美国充当亚洲安全保障的中心,为保持两者的平衡而煞费苦心。另外在民间学者当中也有不少从经济效率理论的角度提出应该把扩充 APEC 作为日本的方针。^⑲

但是,日本必须考虑到美国政府最终很

可能把它设计的构想强加给自己的危险性。作为美国依然认为 NAFTA 更加重要,并采取使其与 APEC 相联结的方式。而且从它的战术目标来看,美国在积极筹备 APEC 的首脑级会议,动摇中国地位的同时,力图在日中间嵌入一个楔子。因此,任凭美国随意行事的作法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里日本必须返回起点进行思考。最初东盟要推进的是逐步建立起几个松散的国际组织以顺利地进行国家建设。为此,它一向坚持在东盟优先的原则基础上尽可能地协助 APEC 的方针。作为日本必须始终遵循东盟的意愿,同时推动其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前进。而且,必须对美国操之过急的政治化提出批评,并尽力加以纠正。不过,日本向来过份地推行本国中心、经济发展中心的外交政策,所以日本的主张恐怕对东盟、对美国都不会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为了增强日本的说服力,日本自身必须排除国家中心主义,参与建设更为公平的国际共同体。

当前,国际政治也在从国家中心的时代向如何对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作出贡献的时代发生转变。不言而喻,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际社会、国际组织的形成本身已经成为严峻的国际竞争的对象。其中主角依然是主权国家。但是,战胜这种竞争的关键恐怕仍然在于本国真正实行的国际化达到了什么程度。东盟地区论坛将取得多大成功,正是今后日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自身适应能力的试金石。

注释:

- ①例如,东京大学玉野进教授叙述道:“今天‘地区主义’以出乎预料的共鸣受到各地的普遍欢迎,其发展方向和前景不仅仅停留在作为居劣势地位的‘地方’抵抗居优势地位的‘中央’这一过去的模式。可以说它进而超越这种模式,其目标是使自己等同于这些地方的定居市民的、在自主和自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行政、文化的独立性,……因此,

有时会对国家的统治、行政的状况提出修正运营方向。”鹤见和子、新崎盛暎编:《玉野井芳郎著作集》,第3卷,学阳书房1990年,第8页。

- ②岩波讲座《社会科学的方法》,第7卷,岩波书店1993年,第190页。
③同上②,第212页。
④原宣之:《东盟》,有斐阁选书1990年增补版,第2页以后。
⑤滨下武志:《日本研究和亚洲及同一性》,《思想》杂志第330号,1993年8月,第137页。
⑥1970—198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泰国7.2%、印尼7.8%、马来西亚7.8%、新加坡8.5%、菲律宾6.2%。
⑦黑柳米司:《东盟十五年的政治总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问题》,1983年2月号,第17页。
⑧邱恩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治关系的新发展》,载于《成蹊法学》第36号,1993年,第42页。
⑨在日本成立了推进 EAEC 日本委员会事务局,1993年5月已实际开始进行宣传活动。它把重点放在使东亚地区与欧洲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并行成为一个经济圈。
⑩在创建东盟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对工业化拥有自信的泰国主张期限为10年,但最终印尼的15年期限达成妥协。进而还采取了菲律宾等国提出的缔结6国-X方式的要求,即因降低关税而对国内产业造成打击的国家可以退出协定。可以说以几个国家的实施为目标,是“留有缺口的条款”(《每日新闻》1992年1月29日)。这确实是有些符合东盟性格的柔软的国际合作协定。
⑪詹姆斯·贝克:《对亚洲政策的新大纳》,引自《中央公论》1992年1月号,第349页以后。中央公论社特与《外交》季刊签有合同,全文翻译该篇文章,并对大部分的主要论述加以解说。以下未特别注明的,均引自《中央公论》。
⑫斯卡拉皮诺:《亚洲掌握美国21世界的关键》,载于《中央公论》1992年2月号,第398页。
⑬陆琛:《美国的太平洋共同体构想》,载于《北

京周报》1992年5月5日,第17号,第26页。

⑭通商产业省,《通商白皮书(名论)》,1993年6月10日,第10-11页。

⑮同上⑭,第271页。

⑯同朝日新闻社与美国盖洛普公司共同进行的调查,《朝日新闻》1991年11月18日。在美国肯定者为52%,否定者为38%。

⑰由朝日新闻社与美国盖洛普公司共同进行的调查,《韩日新闻》1992年9月27日。

⑱《防卫手册》,朝云新闻社1993年版,第535

页。

⑲如山泽逸平在《亚太国家对日本的期待》一文中采用“引力模式”的计量方法来计算贸易量大增的“综合效果”,主张只有APEC才能推进区域自由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是与实行贸易自由化相符合的区域联合形态。载于《外交论坛》,1993年7月号,第53-54页。

刘苏朝 译

科研信息

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研究所成立

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研究所于1994年1月成立。该所成立的目的在于加强我系对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的研究,促进我系与国内外相应学术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以适应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其主要任务和活动形式如下:

1. 为我系本科生、研究生及外国留学生开设有关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的课程,并积极创造条件,举办短期培训项目,为国内其它院校、商业机构和企业公司培训教师和在中东国家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
2. 举办学术研讨会、报告会、专题讲座和座谈会等各种学术活动。
3. 组织有关专著、论文、调查报告、译著、资料的编写和研究成果的交流。
4. 同以色列、美国和其它国家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进行人员和学术交流,协商进行合作计划与协作项目。
5. 建立以色列和中东问题图书资料中心。
6. 为了便于交流科研成果和信息,本所拟编辑出版《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研究》,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交流。

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研究所以我系从事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研究的教员为主,广泛吸收校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以上各种学术活动。

(李 湖)